

抗日战争研究

KANGRI ZHANZHENG YANJIU

4
1993

封面设计 马晓光

需购《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1992年、1993年各期者，请与本刊编辑部（地址见封二）联系，共10期25元，另加邮资5元。

本刊1994仍在邮局发行，全年共出4期，每期3.50元，另加邮资3元。

抗 日 战 争 研 究

1993年第4期

出 版 者 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印 刷 者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发行 邮发代号：82—47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 Q187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刊号 ISSN1002—9575

NO11—2890/K

国内定价2.50元

抗日战争研究(季刊)

1993年第4期 总第10期

目 录

- 日军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战”考证····· 李恩涵(1)
日中战争十五年与中国女性····· [日]笠原十九司(28)
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 何 吉(37)
对《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记录片》
一文的补充····· 刘燕军(52)

-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丝绸业的摧残····· 王 翔(57)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矿业政策····· 唐 凌(75)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科技进步述评····· 张 瑾 张新华(96)
“满洲”建国大学与日本····· [日]山根幸夫 周启乾译(120)

- 绥远抗战述论····· 余子道(129)
台湾研究中国空军抗战史简述····· 唐学锋(147)
抗战时期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 张明楚(151)

- 台湾抗日五十年····· 钟安西(158)
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 楼子芳(182)
台湾少年团述论····· 陈小冲(197)

· 抗日战争纪念地纪念馆 ·

-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赵兴胜(211)
张北苏蒙联军烈士陵园····· 裴焕利 任 冰(219)

· 学术信息 ·

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 (222)

对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研究的一次交流

——“中国近现代名人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

综述…………… 郭卫民(223)

南京大学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陈红民(226)

重庆议建陪都抗战博物馆…………… (227)

芷江兴建抗战胜利受降城…………… (228)

· 书讯 ·

《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 冯玉荣(222)

《民族工业大迁徙》…………… (229)

《抗战时期国军人事》…………… 以 林(229)

《民国空军的航迹》…………… (230)

《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纪实》…………… 冯玉荣(230)

《日本侵晋纪实》…………… (95)

《花冈事件记闻》…………… (181)

1992 年抗日战争史论文目录索引

……………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231)

本刊 1993 年各期目录索引…………… (249)

本期英文目录…………… (253)

图片…………… (封三)

本期出版时间 1993 年 11 月 26 日

日军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战”考实

李恩涵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社区内所犯下的对非战斗人员的罪行与暴行,实在是罄竹难书。为未来东亚和平的大局着眼,对于日军这些罪行与暴行,史学研究者应予以客观地、完整地揭露出来,才不负他们对于人类正义与国际和平所应负的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根据不完整的资料统计,单单就八年抗战期间日军对中共区内人民的屠杀,就有 318 万人之多,被抓运往东北或日本做奴工的华北人民则达 276 万人;其中晋绥边区有 35 万人被杀,被抓者 9 万多人;晋察冀边区有 48 万人被杀,近 30 万人被抓走;冀热辽区有 35 万人被杀,39 万人被抓走;晋冀鲁豫区有 98 万人被杀,49 万人被抓走;山东中共区有 90 万人被杀,126 万人被抓走;苏皖边区有 24 万人被杀,中原中共区则有 7 万人被杀。^① 其他财产物资的

① 左禄编:《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2页;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第94—95页。至于在整个中日战争(1937—1945)期间,我国军民死伤数目,一说为1500万人(官方资料称,我军战死130万多人。因中国军队伤亡多不正确呈报,故此数字实为太低)。另据1947年联合国的估计,称我国平民死伤900万人。另一说则称我国军民死伤11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者6000万人(见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1937—1945*, N. Y.: Pantheon Books, 1986, pp. 295—296.)另蒋纬国将军称,中国军队阵亡者320万人,平民死亡者2000万人,共2320万人;陈其田教授估计中国军民死亡1800多万人;中国学者罗焕章则估计中国军队伤亡380多万人,人民死伤1800多万人,合计2180余万人;财产损失共6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共计1000多亿美元(当时币值),见罗焕章:《中国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贡献》,《抗日战争研究》(北京),1991年第2期,第33页。

损失,数目更是庞大,只以本文所拟讨论的晋察冀边区而论,即有188万间房屋被毁,损失粮食101亿斤,耕畜57万头,猪羊169万头,农具、家俱2441万件,衣服2113万件。而在上述全部七个中共根据地区内,八年期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则共计有1952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头,农具、家俱2亿2270万件,被服2亿2963万件之多。^①而其中最大部份的损失,是来自于日军的所谓“三光作战”。

一 “三光作战”的实质及背景

“三光作战”为“烧光、杀光、抢光”之简称,是日军对于我一定的抗日地区内杀戮居民与对粮秣房舍与其他物资设备的彻底破坏的总称;它是由中共的党政通告与传播媒介根据日军对共区大规模“扫荡战”中残酷的屠杀与破坏的事实而对其战术予以简括化的一个中国名词。^②日本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则称之为“烬灭作

①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95页。

② 参阅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著:《昭和史》(东京:岩波书店,1955年),第184页;江口圭一:《中国战线の日本军》,见藤原彰、今井清一编:《十五年战争(2)日中战争》(东京:青木书店,1988),第59—60页;另参阅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治安作战(一)》(原名:《北支の治安战(一)》,朝云新闻社,1984),(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第448—469页;根据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资料集,1939年9月—1941年12月》第10册(东京:劲草书房,1974)中所搜集的中国党政资料中,1939年9月“中共晋察冀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告边区同胞书”内,虽然其中详述日军在该边区内毁灭村庄、掠夺放火、到处杀人等等,但未提“三光”一词。1940年7月,朱德在《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三年——在延安于都会议上的报告》中,也历述日军进攻中共根据地之扫荡战中的种种野蛮残酷的“放火杀戮”的事实,但也未提到“三光”这个名词。惟在1940年8月“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发动了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连续多次的大规模扫荡屠杀之后的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即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上述各处的扫荡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其野蛮暴行,惨不忍睹(见刘健清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9页)。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在社论《精兵简政》一文中,又提到“三光”的种种残酷与应付的适当对策(见《中国共产党资料集,第10册》,第549—550页)。此后“三光”即成为中国方面表达日军“杀光、烧光、抢光”暴行的家喻户晓的名词了。

战”、“彻底的肃正作战”、“彻底毁灭”、“彻底的扫荡”、“彻底击灭”、“讨灭作战”等等。^①“烬灭作战”即是烧尽灭绝，烧光杀光的意思，一个人不剩的杀光，一间房不留的烧光，一点东西也不留的抢光；这当然就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的同义词了。其他日人术语虽然略有隐晦，但其在作战上的实际意义，也与“烬灭”非常相近。^②这是将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华普遍地对抗日地区不同规模的屠杀与破坏一变而为有系统、有组织地大规模的屠杀与破坏，根据“凡被怀疑是抗日者即予格杀毋论”的想法，要彻底摧残中国军民抗日的战斗意志与物质基础。^③此种战术的始作俑者，是曾经担任过多年侵华的前锋、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任过伪满洲国军事最高顾问、又曾担任过割裂中国东北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后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其后继续扩大“三光作战”暴行，使其达到残酷高峰的，则为继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④

据资料显示，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日军在扫荡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曾下过一道命令说：

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下毒。^⑤

日军第一军(驻山西省)在其《第一期晋中作战复行实施要领》

-
- ① 江口圭一：《中国战线の日本军》，第59—60页；另参阅《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448、469页，及其他各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北支の治安战（一）》（东京，朝云新闻社，1984年增刊），第541、543页。
- ② 森山唐平著，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第44页；森松俊夫编：《指挥者の战训》（东京：图书出版社，1989），第109页。
- ③ Chalmers A. Johnson, op. cit. pp. 207—208, Footnotes 52, 53, p. 211.
- ④ 江口圭一：《中国战线の日本军》，第59—60页；齐福霖：《三名中国通与华北分治》（见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沈阳，1991），第6—9页。
- ⑤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80页；另参阅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第159页，转引《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8月15日，“日本暴行座谈会纪录”；叶昌纲：《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见《山西文史资料》，第56辑（1988年第2辑）（太原），第92—93页。

中规定,凡认为具有敌意的15岁至60岁男子,一律杀戮;对共区根据地的武器、弹药和粮秣,一律劫收带走;对于“敌性部落”(敌性村庄),要烧毁破坏。^①原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士兵菊池义郎对他亲身参加过的“三光”扫荡,作过如实的记述说:

我们日军每到一个村庄,要破坏所有的家俱杂物,烧毁房屋。我们常说,如果约500人的部队在100户左右人家的村庄驻一夜,这个村庄恐怕十年也恢复不起来。不过,对日军来说,这正是他们的目的所在。^②

1940年(“三光作战”尚在开始阶段),一位外籍传教士经过河北与山西两省,报道日军在这两省扫荡的情况时说:日军在扫荡中,常将1/3或1/4的村落烧毁,并杀死几千村民。所有较大规模的扫荡,都附有很多空卡车,将可以看见的值钱东西全部掠回城市。所有的牛都被赶走杀死,大约河北、山西有一半的家畜,都被杀光。在许多村庄,因为鸡都被杀光,就无法买到鸡蛋。^③一位中国教授也说:在鲁北,“日本人抢光一个市场中所有的东西,使农民变成双手空空。日本人将他们有用的东西拿到城市,而将其所抢到的东西运到市场,卖给老百姓”。^④英记者林德西(Michael Lindsay)报道日军这种对于民众无差别的恐怖屠杀,认为如果这种无差别的恐怖不停止,则民众将无所适从。^⑤美人泰莱教授(George E. Taylor)则认为,中共区抗日民族思想的高涨,是无可遏止的,日军则用恐怖政策以对付之。^⑥重庆《新华日报》于1940年7月3日报道说,由于敌人在华北中共军的游击区内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的房舍已变成废墟,富民多持金钱财产逃避他方。游击区与敌占区犬牙交

① 江口圭一:《中国战线の日本军》,第61页。

②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80页。

③ Edgar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 p. 351.

④ Ibid.

⑤ Chalmers A. Johnson, op. cit. p. 50. M. Lindsay, The North China Front, pp. 8-10.

⑥ Johnson, op. cit. p. 50. 引 George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p. 116.

错,区内常处于战争状态,因而使敌人所造成的破坏,不易重建。

二 1939年秋季前日军 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扫荡战

单就日军所进攻的晋东北、冀西与冀中而言,前两者属于中共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后者则为该边区的冀中区。北岳区和冀中区为平绥、平汉、正太、同蒲等四条铁路所围绕略如长方形。合计共有36个县,人口超过1000万人,但被日本警备军分割为山西五台山区、冀西易县与满城、冀西唐县、冀西平山等四个分区;其中五台山区为晋察冀边区早在1937年10月即已建立起的第一个根据地;也成为日军扫荡共区的第一个目标。^①1938年9月,日军5万多人分八路包围进攻五台山根据地(大约于同时日军也进攻晋中、晋东南与冀西),但共军以游击战与运动战应付之,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而转移他处。^②

1939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拟定《治安肃正要纲》时,对于华北共军的实力,只视为残余兵或抗日匪团之类的武装力量,非常轻视。^③是年春季,进行第二次对五台山区的攻击,深入繁峙、涞源等地,并进攻阜平,但仍未达到目的。1939年9月日军的秋季大扫荡,更采“单刀直入”战术,以其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直攻深入北岳区的心脏地带;接着又集中二万人实行冬季大扫荡,仅北岳区内的崞

① 唐盛锦:《五台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第119—120页;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第1—16页。

② 唐盛锦文,第120页;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见史料丛书编汇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7—8页。

③ 石岛纪之:《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它的国内国际条件》,见《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73页。

县一县至1939年6月,即有民众四万人被残杀。^①同时期内,日军也展开了对冀中、冀南平原地带与晋东南的扫荡战(1938年11月到1939年3月,日军中等规模三千人至九千人的扫荡部队,五度进攻冀中),冀中36个县的县城均为日军所占,设治安维持会与县长,乡区则为国民政府所属的正规军与游击队及共军所分据。^②日军对乡区扫荡的方法,则以大据点(如保定)为中心,四周设卫星小据点,并以放射状筑汽车道路,纵横其间;再在小据点之间完成环状道路,再将各据点向外扩张。^③

这时,日军在山西开始实行有系统的破坏性的扫荡战,到处破坏民间所有的生产工具,甚至连最原始的手工纺织机,也不予放过,以破坏游击区的经济基础。^④在冀中饶阳县常刘村的战斗中,日军一日间烧遍七个村庄(1939年5月),1939年12月,在无极县以西,三天内也烧毁了二十多个村庄。^⑤朱德在《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三年》的报告中,即指控日寇残酷野蛮,到处放火杀戮,如于1939年4月在晋东南将十县市镇及二十多个村庄的居民各数百、数千全予杀害。^⑥

三 1939年秋季后多田骏的 “囚笼政策”与“烬灭作战”

1939年9月,侵略我国东北、华北的老手“中国通”多田骏继

① 唐盛镛,前文,第120页;《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81页;袁旭等编:《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第197页;古屋哲夫:《日中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85第1版,1991年第10版),第186页。

② 袁旭等编:《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第172—189页。

③ 《北支の治安战》(一),第175页。

④ Edgar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 pp.328—329.

⑤ 吕正操:《论平原游击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73页。

⑥ 《中国共产党资料集》,第261页;藤井高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序说》,第164—165页。

杉山元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实行“囚笼政策”，利用点、线、封锁沟、封锁墙的连贯，广建数百英里的新公路与深沟，以封锁和分割中共在华北各根据地为许多小块。^①如在平汉铁路两侧，即鸠集民夫修成了三道封锁沟与封锁墙，逐渐在铁路两侧侵占扩展了几十里宽的控制区，宽五、六十里，或二、三十里。^②1940年，多田骏又下令在平汉路以东修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条支线；在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区内则修成白晋经临汾至邯郸的铁路，以将太行、太岳区分割成南、北两大块。^③这就是先将中共区严予封锁，以为分区分块地予以消灭的准备，即所谓“囚笼政策”。另又配合以“屠刀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共区的重要中心与军事要地。多田骏更实行“烬灭作战”，即焦土破坏战，几万乡区民众被杀，几千村庄被夷为平地。^④如1940年春，日军向晋东北、冀西扫荡，曾专门组织了“放火队”，每到一个村庄，就纵火一面烧毁民房，一面焚烧民众的粮食，包括已经打下的存粮，及村外即将成熟尚未收割的田禾，并野蛮地屠杀村民和牲畜。^⑤当时仅平山一县，即被敌人烧掉粮食十万石，在大火中成千上万亩的田禾被变成焦土。在定襄县炭沟，敌人夜袭该村，不论男女老幼乱砍乱杀，全村100人中遭难者即达50人，受伤的还有十几人。牛、羊、猪、驴、马等烧焦了的尸体，到处散布，形成一幅空前未有的惨象。^⑥同年4月，日军一一四师团、二十七师团、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等37000多人，也对冀中分区扫荡，历时50天，

① Lyman P. Van Slyke, ed.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U. 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11-112.

② 唐盛镐：《五台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31页。

③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170页。

④ Lyman P. Van Slyke, ed.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pp. 111-112.

⑤ 傅尚文：《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粮食战》，见《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47页。

⑥ 同上。

并增设 367 个据点。^① 1940 年 4 月,华北方面军在所订《华北思想战指导要纲附属书》所列的作战方针内,专列“讨伐行动当以重点指向共产军匪,对其游击队作彻底地扫荡覆灭”。^②

1940 年 8 月 20 日中共军在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白晋路、北宁路、沧石路、津浦路、胶济路等同时发动交通破袭战式的“百团大战”(实际出动兵力 115 个团),历时三个半月,予守备各铁路线与矿场设备的日军以相当大的损害。日军为报复起见,乃发动对晋中、晋东南、平西(冀西)、晋西北、晋东北、冀中和冀南的全面进攻(稍后并扩及于冀东),运用“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战术,向共军各根据地展开残酷地大破坏式的进攻——这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③ 在对晋中作战时,其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 1940 年 9 月 1 日—18 日第一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中云:开始作战时,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曾指示:“应彻底地对敌根据地烬灭扫荡,使敌不能于将来生存。”^④ 其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在所发《讨伐队之注意事项》中称:“此次作战为对敌根据地彻底地烬灭扫荡,使敌将来无法生存,至为紧要。为避免无辜住居者之苦,应明了敌性显著之敌根据地之村落,予以烧弃为止,但此等场合,屠杀掠夺之类之行为应严戒为要。”(作者按:此最后一句为日人惯用的标准的公式文字,常只为虚饰之用,其本意是重前者而轻后者的。这一点,日本公正派学者江口圭一教授曾予特别说明)^⑤

因此,日军在各地逢村烧村,见人杀人,如对晋东南辽县(左权)、和顺、榆社、武乡等十余县的连续扫荡,反复三次,辽县、武乡、

① 刘健清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 165—166 页;吕正操:《论平原游击战争》,第 166 页。

② 江口圭一:《中国战线の日本军》,第 60 页。

③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 537—558,654 页。

④ 江口圭一:《中国战线の日本军》,第 61 页,按田中隆吉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最高 A 级 28 个战犯时,曾担任指控者的角色。

⑤ 同上。

黎城、涉县的房屋 80% 被烧, 内有数十村庄成为焦土。在寿县韩赠村, 敌人把村民集中起来, 用机枪扫射, 一次就杀死 360 人。^① 在山西昔阳西峪村, 一次屠杀村民 386 人, 是为西峪惨案;^② 又在该县南北界都村, 活埋村民 75 人。在冀中赵县则制造赵家庄惨案, 被屠村民达 2200 多人, 屠杀地方政府人员 800 多人。^③ 1940 年 9 月 13 日发生的平定马家庄惨案, 是日军用刺刀逼迫该村民众 140 多人至该村下街马庆深家的圈房内, 把房门锁住, 全部烧死。1941 年 3 月的绛县西南村的惨案, 则是将村民赶进石家窑村的三孔窑洞内, 以手榴弹和燃烧弹全部炸死。^④

1940 年 10 月 13 日开始, 日军并再度大规模的讨伐北岳区的冀西和晋东北, 自南拒马河上游到阜平附近, 先自北向南, 然后再由东向西, 平行前进; 在易县毁房 2200 多间, 在该县常峪沟一带屠杀民众 800 多人, 其中北棋村村民 40 多人系被扔进井中而死。在五台县则摧毁大小村庄 98 个, 毁房 20067 间, 杀民众数百人; 扫荡持续了两个月。^⑤ 当时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即确认中共军为最顽强、最危险的敌人, 指示应经常改变与改进战术以对付之。曾同样训练迅速而机动的游击队, 并利用小部队化装为平民, 以突然袭击共区村庄中的中共军。^⑥

1941 年 1 月 12 日至 13 日, 华北方面军在北平开兵团长会议, 其通过的《肃正建设计划》中, 再度规定对共军根据地要用“覆灭战”, 要“彻底的实行”。^⑦ 其情报人员则视华北共军根据地为“治安之癌”, 并估计其在 1940—1941 年时的正规军实力, 已达 25 万

①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 第 562—563 页; 魏宏运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第 160 页。

② 《塞北抗日根据地纪事》, 第 160 页。

③ 同上, 第 196 页。

④ 叶昌纲:《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 第 88 页。

⑤ 《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 第 197 页; 左禄编:《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 第 431 页。

⑥ Edgar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 p. 350.

⑦ 《北支の治安战》(1), 第 432、467—468 页。

人；而合计华中的共军，则最少当为 35 万人，另外其他系统的兵力，共有约 100 万人。^① 在日军实际进攻晋西北的方山县、临县、交城、汾阳、离石附近之共军根据地时，即实行“彻底的覆灭”战术。^②

1941 年 1 月 16 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对支（中国）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要在 1941 年秋后将在华之作战态势改为长期持久战，并计划在数年内减少驻华兵力至 50 万左右，其作战目标将只限于维持既有的占领区，而不再扩大之，对国府与中共区只以“肃正”与扫荡、短时期的奇袭作战为主。^③ 华北日军因此乃于是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开始实行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为同年 7 月至 9 月；第三次为同年 11 月至 12 月；第四次为 1942 年 3 月至 6 月；第五次为同年 10 月），改对共军的扫荡战为“歼灭战”，以“歼灭敌之政权机关为战斗之目标”。^④ 其“三年肃正计划”中，分整个华北为“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1941 年 7 月占全华北整个区域的 10%），“准治安区”（即国府及中共的游击区，1941 年 7 月占全区域的 60%）及“未治安区”（即国府地区及中共根据地地区，1941 年 7 月占全区域的 30%）等三类地区，并计划于 1941 年度内提高“治安区”为 20%，“准治安区”为 50%；另在 1942 年内改“治安区”为 40%，“准治安区”为 40%，减“未治安区”为 20%；而于 1943 年内改“治安区”为 70%，“准治安区”为 20%，减“未治安区”为 10%。^⑤ 所以，华北日军所进行的“歼灭战”（“三光作战”），即更为残酷；如 1941 年春，日军 1300 多人对平北根据地的扫荡，以“分区扫荡”与“梳篦战术”反复扫荡该区的新关赤城第

① 参阅《情报》第 52 号（1941 年 10 月 15 日），华北联络部天津派遣员嘱托新坂狂也，《华北地区における共产党的现势》，第 81 页；《情报》第 57 号（1942 年 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的现况，动向并に对策》，第 4 页。

② 《北支的治安战》（1），第 437 页；另参阅《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东京：みすず书店，1964），第 503 页。

③ 山下龙三：《中国人民解放军—その政战略思想》（东京：劲草书店，1969），第 56 页。

④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 812—813 页。

⑤ 同上，第 823—824 页。

一、四、五区,实行残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①另外,日军在浑源、灵邱、繁峙等雁北地区实行“三光”的结果,只在1941年5月的一个月之内,根据不完全统计,即抓捕群众6000多人,残杀5300多人,强奸妇女7680多人,烧光村庄160个,并抢走大量粮食、牲畜及其他财物。^②而多田骏在报告其“肃正”成就时,则自诩“晋西北、晋察冀边区之共军,为我军连续肃正讨伐,其根据地之设施,已大部覆灭。其过去三年营营蓄积的资材,大部烬灭;军事上受打击至大,而使其积极性为之丧失”。^③

四 冈村宁次的“三光作战”

1941年7月7日冈村宁次(大将)继多田骏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于是月15日到北平就职。8月3日就开始集中日军5个师团与6个旅团之一部分及伪军共7万多人(一说10万人),并出动伞兵与毒气装备,开始自己号称的“百万大战”。这显然系为报复共军前次的“百团大战”命名;由冈村亲自指挥,实行军事、政治、经济的“总力战”,分13路对北岳区和冀西与晋东北与平西区(另也同时进攻冀南、冀中、平北与山东共区),实行为期两个月的空前大扫荡。^④这次大扫荡,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8月13日到9月6日(或4日),首先攻击平北之古北口、密云地区,再将进攻重点移至冀西,占领晋察冀边区的首府阜平,并在倒马关一带反复扫荡,企图围歼共军的主力。第二阶段自9月7日(或4日)至10月16日,则将日军分为许多小股,以对共区腹地地带“分区扫荡”、

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第123页。

② 同上,第136页。

③ 《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第716页。

④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大事记),第145—146页;人民出版社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第137—139页;《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831—834、838页。

“剔抉清剿”，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除消灭共军部队、机关与地方组织之外，有组织、有计划地抢夺粮食、物资，破坏房屋，掳掠牲畜，屠杀与抓捕壮丁等。其疯狂烧杀的暴行，达于极点，有些地区被烧掠的村庄，常常连续几昼夜烟火不息。^①如1941年8月，日军将五台山之上社至耿镇一带划为“无人区”，即在崔家庄抓捕民众140多人抛进滹沱河中淹死，在孟口则淹死40多人。^②在榆社圪垯村则屠杀村民162人。^③在正太铁路线的井陘县则划定八个村庄为“无人区”，抓捕民众4000多人，屠杀350多人，放火烧村，使此八个村庄化为废墟。^④另在河北平山驴山山脚下的十多个村庄内，一天即屠杀700多人。^⑤在平山东黄泥一带村庄，屠杀711人。在冀中枣强东南的董庄、前后陈庄等十多个村庄内，四天即杀害310人。^⑥日军攻进饶阳某村庄后，大部分的村民都跑走了，日军烧了许多房子，杀了许多未逃走的村民，然后将男女老人与小孩约60人驱入一屋，放起火来，屋中人有外逃的即用步枪射杀。^⑦此外，在山西曲阳尚有沟里惨案，被杀的有150多人。其他，有野北惨案、北管头惨案、下陀惨案等，被害被抓走的合计据说共有一万人之多。^⑧

大扫荡的第三阶段为自9月20日至10月16日，然后结束。粗略统计只平西区与北岳区（晋东北与冀西），即有村民死伤4500多人，青壮年被抓走（送东北满洲做奴工）者2万人，房屋被毁者

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大事记），第149页；《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834页。

② 《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第483页。

③ 同上，第440页。

④ 同上，第439页。

⑤ 同上，第438页。

⑥ 同上，第439页。

⑦ 参阅 R. John Pritchard and Sonia Magbanua Zaide, eds.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ranscript of the Proceedings, vol. 2 (N. 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1), Prosecution Document No. 2222 (Exhibit No. 344), pp. 4619, 4621.

⑧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第308页。

15万多间,破坏秋收田禾5万多亩,粮食损失4500多万斤,牲畜损失3万多头、家禽5万多只,农具被破坏者237000多件。^①以日军在晋、冀两省交界处强行制造的“无人区”而言,其开始建立自1941年9月上旬,其目的是要遮断冀西与晋东北的山岳区与冀中的平原区的联系;范围包括从平定二区娘子关,经一、三区到四区南韩区,再经孟县东山,定襄东南山区,五台一、二、三区,直到繁峙、灵邱南山,长约500多里,宽30—40里(同时日军也在平北丰宁、滦平、密云地区及热河的长城内外区制造“无人区”,其范围更为广大)。^②其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日军将平定黄统岭以东的北头岭、铺北、秋林等13个村庄全部烧毁,杀光民众170多人,烧毁房屋4400多间,抢走粮食190多万斤。^③另日军在孟县东部所划定的“无人区”,则将东庄头一带88个村庄的4000多村民,全部赶走,60多名被杀。^④以后又将“无人区”扩大包括146个村庄,使3万多村民无家可归,死于瘟疫的达400多人。^⑤整个孟县境内的“无人区”,则包括影响到251个村庄。^⑥五台县境内的“无人区”,南至牛道岭,北到长城岭,东自晋冀交界处,西到清水河,长百余里,宽30—40里,境内148个村庄中的18000多村民中,被杀的达9200多人,被抓捕而去的280多人,被毁耕地3万亩,被烧房屋9800多间,被抢粮食9660多石。其孤峪沟长15公里,原有5个行政村,人口1万多,但日军把这条沟的人畜杀得所剩无几。^⑦定襄县在南沿山长40里、宽20里的“无人区”,则有20多个村庄被毁。^⑧日军又在平汉铁路两侧各约十公里处修筑了长达500多公

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第154页。

②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第150、151—153页。

③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第150页。

④ 同上,第150、156页。

⑤ 同上,《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307页。

⑥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第156页。

⑦ 同上,第156页;同上,第2册,第54页。

⑧ 同上,第156页。